

我与金日成元帅少年时代的一段交往^①

尚 钺

1927 年秋，我在国民党的酷刑之下，病倒在浙江省陆军监狱，由于一个朝鲜籍医官对政治犯的同情，我于 1928 年初被保出外医治。因这个机会 我逃到了东北 改名谢仲武；由于楚图南同志的介绍，到吉林毓文中学任国文教师。这个学校有不少朝鲜被迫流亡到东北的学生。

这个时期 正是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 实行所谓‘换旗’不久之后 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公开活动 已开始由沈阳伸入吉林。

毓文中学在吉林省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学校，也是国民党特务很注意的目标，虽然他们在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控制这个学校。

我进入毓文中学的时候，国民党也正在积极打入这个学校。有的教员被收买了，还有一些是新由教育厅派来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如教务高某、训育主任何某、体育主任马某，都是该校老教员，这一时期都成了国民党员，并

^① 该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已故教授尚钺的一篇遗稿，写于 1955 年 原件现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革命纪念馆。本书编发时，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渐渐露出憎恨学生进步活动的言语和情绪；这些人在毓文组成了一个反动小集团 以各种方式破坏进步活动 甚至将图书馆的进步书籍收藏起来。另外 他们又一致地歧视占学生人数比重不小的朝鲜籍学生。

但是 同学的活动却更为积极 成立班会、组织演说会、辩论会 出壁报 订阅进步刊物等等。我感到学生中进步组织是存在的，但不清楚是党的还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为帮助党和团推动工作 我选择了李大钊、高尔基、鲁迅先生等革命青年导师的一些文章，进行启蒙式的讲解。

因此 不拘汉族和朝鲜族同学 都与我很接近。我的屋中，经常挤满了充沛着正义勇敢精神的活泼可爱的孩子。这些同学中间 在一年级乙班 有一个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说话不多的朝鲜籍的同学 名字叫金诚柱 这就是后来领导朝鲜人民解放祖国的金日成元帅。

当时他在一年级乙班 是毓文中学的新学生。他常和其他的同学来我处 但每次他总是说话最少的一个。我很注意他这个特点。他使我感觉出他虽然年纪很小（约十五六岁）却在精神深处隐藏着祖国沦亡的惨重伤痛。

为着稍微满足一点他和许多进步同学对我的要求，我尽我的能力和尽快地为他们改作文，并在作文本子上提出鼓励进步和批判不正确思想的冗长批词。一旦谁的文章上我改的少或批语简短了 他们就感到不满足。特别是对朝鲜籍的同学，我曾着重地激励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朝鲜出卖祖国的地主阶级的仇恨，并鼓励他们友爱团结恢复祖国的意志。

我的这种作法，对青年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也使反动分子对我与进步同学更加嫉视。

每逢星期日或假期 我与许多进步同学 经常到吉林背后的北山 或龙潭 或其他风景幽美的地方去旅行。金诚柱虽然平素很沉默 但是到了出外游玩的时候 他总是显出一般健壮青年爱说爱笑的活跃精神来。爬山、游泳、冬日溜冰等活动 他都喜好。他的身体很好 提的问题也多 所有关于文学、艺术 乃至其他许多社会科学的问题，几乎他没有不问的 而他特别着重屡次询问的问题 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侵略的各种问题。记得有一次还谈到安重根。当我谈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采用安重根式的恐怖主义手段是不妥当的 他立时警悟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绝不是搞掉一两个大财阀的走狗所能解决的。必须教育人民群众 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性 组织人民群众。

我们利用课堂，讲述帝国主义侵略及反帝国主义的各种问题。我搜集了当时中国关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论著 拟了一个题纲 为同学作了约一个多礼拜的专题演讲。这讲演 对东北的汉族和朝鲜族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和间接侵略压迫下的青年来说，是特别能够领会的。许多进步同学 尤其是金诚柱的笔记 记得又清楚、又详细。

使我感觉最深的，当时在毓文中学虽然有许多中国同学 包括汉族、朝鲜族 和朝鲜同学 但一般人还存在着狭隘的民族情感的隔阂。而金诚柱和一般进步的汉族、朝

鲜族同学相处的却很融洽。他不仅在班上和所有的同学相处的很和谐 而且他每次到我住室里来的时候 经常是和进步的同学一块儿，使我感觉到他与中国同学之间没有任何隔阂。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当时党或团的教育 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善于团结群众，基本上从自己幼稚心灵中在消灭着这种落后的界限。自然 对于若干汉族的反动教员 特别是他们歧视朝鲜籍同学的恶劣作风 他怀着极大的不满和愤慨。

这时反动教员国民党分子冯某 威胁校长李光汉 要开除进步的同学，特别是进步的朝鲜籍的同学，并且说：“不把这些捣乱分子滴溜 逮捕 起来 学校的课程无法进行”。又污蔑朝鲜同学说：“这些高丽棒子都是日本间谍。”这就暴露出国民党反动派准备迫害进步同学，特别是迫害朝鲜进步同学的卑鄙的阴谋。在毓文中学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进步同学和中朝同学反对反动派压迫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这样一来 反动派就更加仇视进步同学 并特别注意金诚柱。如有一次在教员中间闲谈时 体育主任马某就说：“这些高丽棒子最坏咧 你看 金诚柱这家伙简直仇视我们中国教员。”这是企图激发中国教员对朝鲜籍同学 特别是对金诚柱的恶感的阴谋。当时我反驳说：“他们年纪很轻，不知事的情形是有的。仇视中国教员的情形 我还没发现。”马某立即说：“不要看他年纪小 心里鬼多着咧。”由此 我感觉到这些反动分子 已经在阴谋着要迫害这些进步青年，作他们向国民党反动派报功升官发财的准备了。

我在课堂上辛辣地讽刺着这些卑鄙无耻的反动分子，鼓励着这一百多个追求真理的中、朝两国的进步青年。我教给他们从阶级分析上辨别自己的同伴、朋友和敌人，使他们在阶级社会中对人分清界限，仇恨敌人，并暗示反动分子的阴险图谋。我给他们讲授我所闻所见的一切反黑暗势力斗争的伟大革命英雄人物的顽强奋斗的历史和伟绩，激励他们幼稚的革命意志。

这中间我举的例子最使这些青年孩子感到兴趣的，就是我所知道的有关列宁和高尔基艰苦革命斗争的片断。譬如，列宁在监狱中如何用牛奶写信，指导外边的同志进行反沙皇的斗争，和列宁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类美满社会而奋斗的卓绝事迹。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有的说：“咱们要学习列宁”，有的说：“咱们到苏联去。”但金诚柱却沉默着。我问他：“你不喜欢到苏联去吗？”他的回答是：“我很想到苏联去学习，可是不把日本鬼子帝国主义赶走，在咱们这里是建设不起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最要紧的还是先赶走日本鬼子。”他对于他的民族和朝鲜人民的深沉的热爱与责任心，在他这样幼小的时代，已经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所以，他总是问：“用牛奶怎么能写信呢？”“列宁怎么能同外边的同志联系呢？”显然他的幼小的心灵中，此时已经很隐秘地决定着长期的艰苦的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决心，因而，要从我的浅薄的经验和知识中，学习列宁和许多革命工作者的斗争经验了。

我也教给他们连我自己知道也很少，实践也很幼稚

的斗争经验和知识。我很想尽量搜罗一些培育他们建立起共产主义人生观 和为共产主义、为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人民大众而斗争的方法和经验。可惜 当时我不过是比他们大几岁的大孩子 不论是知识和经验 都还是异常浅薄和幼稚的。

在这样的课堂上 许多进步的学生 都饥渴地希望从我的浅薄幼稚的讲说中 吸取着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特别是在一年级乙班的课堂上的前两排，由于他们年纪最轻，人也最小 对于我的讲话最为注目。尤其是其中我最喜爱的几个最小最进步的同学 其中即有金诚柱 当时为反动派所嫉视的孩子。

因为在我的课堂是这样的课堂，为着尽我所能帮助每一个同学向他自己所要求的方向发展，所以作文题目我虽然也出 但经常让他们自拟 让他们能从作文上 获得他所要求的我的适当帮助。因之 每周一次作文 各种文体 各种意见 都在作文中尽情发表出来 其中 我最深切记忆着的，就是金诚柱的文章。

虽然有叙述 有议论 有散文 有诗歌 但却有一个总的精神 那就是团结广大工农群众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 争取民族自由 解放祖国。在有些叙述文里 他尖锐暴露出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穷凶恶极的榨取，暗无天日的压迫 以及朝鲜人民群众被迫害而陷落于颠簸困苦 流亡异域 辗转于死亡线上的悲惨生活。因此 在另一些文章里 他就歌颂着朝鲜民族英雄李舜臣 和冒险主义的英雄安重根。

所有这些 就说明了金日成元帅在少年时代 不仅已把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恢复祖国的重担肩负起来了 而且从少年时代 努力锻炼自己 多方面地诚恳地吸取为完成自己所负担的历史任务的知识和经验，学习着团结群众，使自己能负担起这一个艰巨而伟大的任务。

所惜的，只是我的知识不足，斗争经验又十分缺乏，当时未能给他更多的帮助。而且我自己在学期末 便被毓文的反动分子“欢送”出来 带着我对毓文中学的许多同学的热爱 离开了吉林。

我了解的有关杨献珍的哲学“罪案”

艾 恒 武

杨献珍同志逝世已经三周年了，今年的7月24日是他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杨献珍一生所走过的路程中有相当长的阶段是坎坷的。两次被敌人逮捕 第一次经社会各界营救无罪释放 第二次被捕 被判处死刑 经过翻供斗争 改判有期徒刑 抗战前夕 经党营救出狱进行抗日。1959年康生借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模式 把杨献珍批判‘五风’的言论诬蔑为反党、反“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打击 把校长职务降为副校长。1964年康生又抓住杨献珍用中国古语‘合二而一’表达对立统一规律 定性为修正主义 企图在政治上将杨献珍一棍子打死。罗织了杨献珍十大“罪状”免除了他的中央党校副校长和校委委员职务，调出中央党校。

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这一冤案 是由我按照他讲课的思想 写了《‘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 闯了“塌天大祸”使杨献珍犯了“弥天大罪”。康生是怎样制造这场冤案的 我作为一个当事人 有责任将我所了解的经过，写出来作为信史留给后人。

杨献珍对“合二而一”概念的采纳

杨献珍采纳‘合二而一’这个提法 是有个不短的过程的。1956 年 列宁的《哲学笔记》中译本出版。杨献珍看到《谈谈辩证法》中说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列宁写道：“参看……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斐洛说：“因为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 所以在把它分为两半时 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用古希腊人的话来说，他们的伟大而光荣的赫拉克利特不就是把把这个原理作为自己哲学的中心并作为一个新的发现而引以为自豪吗？”看了这段话之后 杨献珍想 对立统一规律既是一种普遍规律 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能在古代希腊的大思想家的头脑中得到反映 中国古代也有很多大思想家 也一定会有反映的。但在中国思想家的头脑中怎样表达的呢？他留心探寻这个问题。1961 年他在《兰由县志》中看到一段话 说宋朝有一位思想家叫吕大临 著有《老子注》 晁公武介绍这部书的大意：“盖以老聃之学 合有无谓之元，以为道所由出 盖至于命矣。”并指出《老子》第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 当其无 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 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 以为室 当其无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为例。杨献珍认为‘合有无谓之元’就是对立统一思想 同黑格尔认为‘存在’和‘无’的统一或不可分性提供转化、生成 是很相近的。1963 年明朝方以

智的《东西均》出版 其中提出“合二而一”。杨献珍说：“我认为这个提法与斐洛说的‘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是一样的意思。‘合二而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的表达法。在看《东西均》这本书时 我采取了‘合二而一’的提法”。

杨献珍讲“合二而一”的背景

1958年3月15日 杨献珍在给中央党校干部作《关于整风第四阶段的任务和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报告中说：“这次整风是全民整风 为的是要在全中国人民中消灭资产阶级思想 确立共产主义思想。现在全国各地都在为建设社会主义搞大跃进 人人都在大跃进 而资产阶级思想则是跃进的绊脚石，非把它彻底去掉不可。”5月3日他应北大校长的邀请 给北大哲学系师生讲《关于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理论工作跃进的关键》。1958年8月，他带领中央党校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到十三陵水库建设工地参加劳动 看到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积极性 他的情绪也异常兴奋。应邀给参加劳动的人员讲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精神。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 工人阶级是改造世界的人，改造世界的人必须学习使用改造世界的工具。”⁶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唯一能够使我们对于世界上的事情获得正确认识的认识方法。”马克思曾经预期将来的世界是一个哲学的世界。我们希望我们的

新中国变成一个哲学的中国，把哲学普及到社会主义中国的人 应当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一重要组成部分。”他还说：“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中 建设社会主义 如果没有对于总路线的统一认识，就不能有统一步调、统一行动，……那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搞不好的。怎样才能使大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有统一认识？那就只有大家都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才是。真理是客观的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只能有一条。只有大家有了统一认识 统一行动 才能发挥出无比伟大的力量来。而达到统一认识的方法 就要用唯物辩证的方法。”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 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 同时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根据中央指示 中央党校除新疆干部班和自然辩证法班外，其他各种班次均停办 工作人员除一小部分留校坚持工作外 大部分下放到农村、工厂 在大跃进中锻炼。杨献珍领导新疆干部班和自然辩证法班学员 和留校工作人员，为完成“1070 万吨钢”、“提前完成12年农业发展纲要”贡献力量。学员用土法炼钢 行政处种一亩小麦试验田。煞时间形成生产热潮 学员楼的院子里 机声隆隆 烟雾迷漫 学员们夜以继日炼钢。行政处参照社会上的贯彻“农业八字宪法”的丰产经验 把土地深翻三尺 分层施肥 采取密植 下种二百斤 等等措施。没有订产量指标 是想看看到底能产多少斤。长出的苗太密 拔一行留一垄 垄中疏苗 还密不通风 就架起鼓风机往田里吹风 为防倒伏 钉上木桩拉上

草绳扶苗。就这样不断努力 收了 734 斤。杨献珍还到山西太谷、河南登丰看望下放干部，了解那里的情况。以后他又到河北徐水、河南七里营、嵯峨山等地视察 新疆班和自然辩证法班学员也跟他到这些地方参观，在大跃进中学习。

杨献珍在视察中看到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异常高涨的同时，他看到听到实际工作中出现订生产计划的浮夸现象 有的社队订亩产小麦几千斤、几万斤、几十万斤 甚至有个别社队订到 120 万斤的计划。虚报产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有的社办工厂 白手起家 苦干几十天 要生产出汽车、拖拉机、飞机 甚至要造火箭放人造卫星。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一大”就是越大越好 并小社为大社，一乡一社。“二公”就是越公越好，消灭一切私有 不仅平调农民的生产资料 而且平调农民的生活资料 归集体所有和使用。在分配上 实行食堂吃饭不要钱 有的把“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嫁”全包下来 实行各取所需。在生产上 贯彻“全民炼钢”把农业劳动力调到钢铁第一线 背矿石 建土炉 大炼钢铁。农业战线只剩老弱妇女 地里的粮食收不回来。用片面性形而上学方法指导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提出深翻土地“越深越好”，密植是“越密越好”施肥是“越多越好”，有的地方由于这种极端做法 造成颗粒无收。收购农产品 按虚报数字收购，只购不留，甚至把农民口粮、牲畜饲料和种子都给“购”去了。这些做法遭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抵制 就用强迫命令的办法推行 轻则辩论、打骂 重则捆绑、关押、饿

饭。由于购过头粮 群众挨饿 造成非正常死亡。干部在群众生活困难时 多吃多占 生活特殊化。这些问题当时被概括为“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生活特殊风”统称为“五风”。

就是在上述的历史条件下 杨献珍对“五风”进行了严厉的尖锐的批评。他首先是从 1958 年 11 月 19 日给新疆班和自然辩证法班讲《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作用问题》开始 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批评。

随着“五风”的表现和危害越来越严重 杨献珍批判“五风”也越来越尖锐、“刻薄”。1959 年 6 月 12 日和河南省委党校、抚顺市委党校参观组的谈话——《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狠狠批判唯心主义》；1959 年 6 月 19 日在全国文联作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报告；1959 年 7 月 29 日和中宣部政治经济学学习班的谈话——《离开唯物主义是危险的》以及 1959 年 10 月 13、14 日在中央联络部组织的一次集会上发表的讲话：《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这几次讲话 是杨献珍批判“五风”的代表作 也是康生抓杨献珍“右倾机会主义”的把柄。杨献珍说：“有人说：‘实践就是理论 读书就是教条’。……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读书就不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吗 我看靠不住 如有的地方提出：‘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 就怕想不到。胆量等于产量，思想等于行动 这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 弄虚作假总不能算作唯物主义吧 可是去年 弄虚作假几乎成了

‘流行病’。河南的西平县某公社胡吹‘小麦亩产 7320 斤’，有个科学刊物叫做《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8 年第 4 期上登了一篇题为《揭开了 7320 之谜》的文章，……捏造了许多‘根据’和‘理由’，把虚构的‘7320’说成是真的。我看把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掩盖 7320 的谎言’才比较切合实际。科学刊物发表这样的文章，到底科学不科学呢？还有这样一个生产队，为了虚报丰产，放假卫星，就把几十亩水稻移栽在一块供参观用的水田里。白天晒死了，夜间再移栽新的。像这样的卫星还是以不放为好。某地三官庙乡，被称为‘哲学之乡’，他们在大办钢铁时提出的口号是‘超鞍钢、超美国、超苏联’。这个实现‘三超’的哲学之乡，它的哲学到底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列宁说过，离开唯物主义是错误的、危险的，甚至是反动的。有些人把列宁的这些话忘记了。还有人拿着唯心主义当宝贝，说什么‘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的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等等。现在应当好好地检查一下，到底是虚报能鼓足群众干劲呢？还是实报能鼓足群众干劲呢？虚报的结果搞得没饭吃，搞得群众脸都浮肿了，这叫群众脸上有光吗？”⁶⁶ 面对着唯心主义成灾的形势，党校现在的任务更重了，要培养实事求是的作风，要狠狠批判唯心主义思想和由此产生的荒唐行为。不把唯心主义批透，说不定哪一天还会刮起这种风来。杨献珍说：“去年刮的‘共产风’，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而是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东西，马克思把这种思潮叫做原始的共

产主义。‘共产风’实际上就是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初期、在欧洲一度流行过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潮的中国形式。它的主要特点就是绝对平均地分配社会财富。要是我们把去年刮‘共产风’的人有关思想研究一下，就很容易看出古今中外的原始共产主义是何等相似。有人说：公社成立后，就是各取所需，要什么有什么，……共产主义使人们享受共同待遇，不分技术高低和劳动创造的财富多少，……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有钱一律归公，孩子也是大家的。劳动的有吃有穿，不劳动的也有吃有穿，什么都是人人一份，什么你的、我的，都是一个样。”马克思指出：原始共产主义实质上是私有制的普遍化，即普及到集体的每个成员那里的私有制的表现形式，……原始共产主义既然是以实现普遍化了的私有制来反对一般私有制，它势必要把一切不可能为每一个成员所私有的财富破坏掉。……他们要求人们平等地占有财富，结果是财富的消灭，他们为了分配的平等而否定人们才能上的差别，可是只要人们的才能上还存在着差别，分配上的不平等实质上是平等的表现形式。否定这种形式的平等，就把平等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结果是生产率下降，以至整个社会经济破产。因此，恩格斯非常生动而深刻地把这种思潮叫做‘狂暴的幻想’。”

“用原始共产主义来消灭私有制，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倒退，倒退到尚未达到私有制的生产力水平的社会里去。在那里，没有任何文明与文化，只有一群贫困的、没有理想的人，他们和物质世界的关系用近似于动物对物质世界

的状态表现出来。我也很怀疑有些热衷于刮‘共产风’的人能否言行一致，真正愿意去过他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生活，因为马克思还说过‘原始共产主义不过是挂着公有制幌子的‘私有制的卑鄙的一个表现形式。’随着去年的‘共产风’一齐而来的还有各种胡言乱语。有的人说‘建成共产主义只要人民觉悟提高就行了，不一定要物质基础很丰富。……进入共产主义不是根据什么规律，而是由某个人说就算了。’这些大概是他们‘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吧！”杨献珍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马克思严格地依据历史和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来论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正如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所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我们有些同志，……不分析我们经济上成熟的程度，不考虑物质基础，凭脑子一热，凭主观愿望，嘴一张，以为说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本来是集体所有制，这样的所有制是和我们现实的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合的。如果在公社成立后，谨慎行事，现在的情况会好得多。可是有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急急忙忙地宣布改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又急急忙忙地宣布全民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这就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不同的社会阶段，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给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准备好了条件，只有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够为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

社会过渡提供物质基础。一切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都必须首先热心于积极地、老老实实在地发展我们的生产力，为全国的'高度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努力奋斗。”去年也有‘浮夸风’、‘瞎指挥风’，……主观能动性当然要讲，但排斥客观规律性的主观能动性则是瞎指挥的思想基础。”杨献珍针对“强迫命令风”的较为普遍存在，引用毛泽东的话说：“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人与人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敌我关系，处理人民群众与敌人的关系就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再一种是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处理这种关系，毛泽东同志讲要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也就是群众路线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因此，……首先应当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这个最根本的问题研究起，才能把群众路线研究得比较深刻、透彻。”他在尖锐地批评“五风”的同时，以急切的心情，用唯物论、辩证法原理结合当时的实际，论证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以使之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进程相符合。

1959年8月杨献珍参加了庐山会议后期的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结束后，“反右倾”斗争开始推向全党。康生这个批判彭德怀的最积极的分子，抓住杨献珍的几次讲话、报告中批判“五风”的言论，按照庐山会议批判彭